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建构研究

王一冰

摘要 以内容分析法解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以及所建构的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研究发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往往将中国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文明交流的数字原住民、中俄教育合作的受益者以及西方政治打压的受害者。这种形象建构虽有利于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全球话语体系，但会导致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被固化，从而陷入认知陷阱。

关键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 (2025) 383-0110-04

DOI:10.16607/j.cnki.1674-6708.2025.14.019

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一直以来，中国留学生都是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在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相较于没有留学经验的人员，中国留学生依靠其多元的文化背景能够以外国观众更好接受的方式对中国故事进行二次编码，从而减少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成为海外受众认知和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海外媒体对华传播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

1 研究设计

在样本选取方面，本文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站（以下简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编码，探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及其建构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故本研究共提出两个研究问

题：

RQ1：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是什么样的？

RQ2：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

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确定以下类目：报道体裁、报道对象、报道情感、报道话语、报道框架（表1）。研究者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搜索含有“中国留学生”的相关报道并利用Python采集了全部894条数据。此后，经人工筛选将剩余492条数据样本导入DiVoMiner软件进行编码。

表1 类目表

类目	具体内容
报道体裁	1. 消息；2. 通讯；3. 新闻采访；4. 评论；5. 其他
报道对象	1. 在俄留学生；2. 在发达国家留学生；3. 在发展中国家留学生
报道情感	1. 乐；2. 好；3. 怒；4. 哀；5. 惧；6. 恶；7. 惊
报道话语	1. 宏大叙事；2. 微观叙事
报道框架	1. 教育合作框架；2. 政治化框架；3. 文化交流框架；4. 社会生活框架；5. 其他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建构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24-23X-A1。

作者简介：王一冰，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

2 框架叠加下中国留学生的多元媒介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多元叠加的媒介框架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主要塑造了三种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

2.1 促进中俄文明交流的数字原住民

中国留学生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使者。据编码发现，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所报道的关于在俄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新闻中，包含“好”和“乐”的积极情感词汇的报道占据总量的80%以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把“文化交流框架”与“社会生活框架”相结合并赋予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将中国在俄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文化交流的中介形象。如《留学俄罗斯的小伙伴带你体验俄味新年》报道中，在俄的中国留学生将中国过年文化与俄罗斯风情相结合，使得中俄文化在新年的这一刻交织交融。这种文化议题的报道虽无法像社会政治议题报道具有鲜明的故事起伏，但是报道中蕴含的情感能够打破中俄文化壁垒实现话语的融通。该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积极形象塑造拉近了与中国观众之间的距离，满足中国观众对中国国际大国形象的想象，消解中国观众的心理防线，增强中国观众的身份认同。

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从中国留学生个体化的叙事角度介绍俄罗斯文化，以个体化、生活化表达映射民族文化之魅。近年来，在俄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为“Z世代”的数字原住民，其掌握新媒体技术并且广泛活跃在社交媒体上。“Z世代”借助社交媒体的特性打造出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文化交流新空间。例如在《用Vlog记录我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这一新闻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了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如何凭借“Vlog”这一后台行为前置的内容表达形式将在俄中国留学生私人生活媒介化，满足中国读者对于在俄生活的好奇心理，通过直观表达传递俄罗斯文化。

2.2 中俄教育合作的受益者

随着中俄两国教育合作愈加密切，中国在俄留学生则成为中俄教育合作的重要受益者。俄罗斯副总理塔季扬娜·戈利科娃表示，2024年在俄罗斯

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8万人，比上一学年增加了1万人，俄罗斯逐步成为中国学生首要选择的留学地点之一。而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也致力于将在俄中国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教育合作的受益者。

总的来看，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于在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中，其将“好”“乐”积极报道情感结合教育合作框架的报道模式出现的频次最高，占报道样本总量的19.47%。这种报道模式一方面与留学生这一群体的自身特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试图通过这一报道模式吸引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教育领域的关注。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的《中国在俄留学生增长至1.35万人》报道中，“增长”“欢迎”“伙伴”等带有“好”和“乐”情感的词汇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中俄两国紧密的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增强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留学的心理认同，激发中国读者前往俄罗斯留学的热情。

2.3 西方政治打压的受害者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不同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建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选择的报道框架和报道情感也有显著不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俄中国留学生时往往采取正面积极的报道策略，而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时往往选择负面情感词汇。根据编码发现，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所报道的关于在发达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新闻中，包含“恶”的情感词汇的报道占据总量的70%以上。而此类报道往往关联着政治化、社会生活框架形成综合叙事体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通过报道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留学遭遇歧视以及对中国留学生犯罪的事件，激发中国读者对西方国家的厌恶之情。厌恶的情绪产生自厌恶的对象，厌恶之情协助划定着自我和他者边界，而被唾弃的对象就是需要远离的他者。而媒体可以利用情感词汇在新闻报道中划清自我和他者的界限，通过具有“反抗”表征的词汇反对他者对自我的打压和污名。如在《美延续对中国学者打压政策 中国500余名理工科研究生遭拒签》报道中，“骚扰”“打压”“拒签”等表达“恶”的词汇将美国塑造成侵犯中国留学生利益和需要远离的他

者。库利说，我们对其他人产生敌意是因为我们所珍爱的自我受到损害而唤醒了愤怒的情感^[1]。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达了中国读者对西方发达国家打压的怨恨情绪，甚至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满足中国读者对中俄合作关系的想象，这同样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话语表征。因此，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中方以及俄方成为对抗他者侵犯，维护国家利益的情感联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使用的合作对抗叙事让中国读者增强对俄罗斯媒体的心理和叙事认同，降低中国受众对俄罗斯媒体内容的心理防线。

3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中国留学生的深层逻辑

通过分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塑造能够进一步挖掘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中国留学生的深层逻辑。这种“他塑”的过程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华传播、设置议题的展现。一方面，对在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能够成为中俄两国观众达成情感共识的象征符号的载体，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这种形象的塑造还会将中国留学生群体困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所建构的认知标签之中，导致理想模型遮蔽社会现实。

3.1 作为达成社会公意的象征符号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象征符号是联结普通情感的统一纽带，尽管最初与这些情感对应的观念之间彼此毫无关联”^[2]。在俄罗斯媒体对华传播报道的过程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塑造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无疑成为中俄受众达成社会公意的象征符号。无论是通过对中国留学生正向报道形成文化和积极情感传递还是通过间接报道达成的情感联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他塑”都是中俄国际关系在媒体报道上的表征。

具体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了一种情感拟态环境，将“好、乐、恶、惧、惊、哀、叹”七种情感融入形象塑造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时，受众的认知和情感都会受到媒体的中介化作用，形成所谓的“媒介化情感”。这种情感也是形塑舆论的一种重要手段。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积极情感融入中

俄文化交流和教育共享的报道框架，无形之中传递了一种美好和共赢的情感。相对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采取的消极情绪报道框架，也在无形之中激发出中国受众排斥和怨恨的消极情感。而在这中间，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文章仅仅是多国舆论博弈以及俄罗斯媒体塑造有利于俄罗斯对华传播的舆论场的产物。公意利用象征符号将全世界联系起来。如果说，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仅仅是作为达成国际社会公意的象征性符号和表征并被赋予类型特征而存在时，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现实中中国留学生的多样性，从而使得理想和现实发生脱节。

3.2 作为被固化的群体形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打开了受众对中国留学生的认识视角，但是同样也限制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认识方式。所谓标签化是指“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3]。不可否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利用多种报道框架塑造了中国留学生多元形象、打造了不止一种标签，但是这些标签类别远远不能涵盖多样鲜活的中国留学生形象。

正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的过程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宏观他者视角，而这种视角下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形象往往是一种宏观群体形象，磨灭了中国留学生多元的个体色彩。此外，中国留学生作为达成社会公意的象征符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的行为也更多是为了建构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形象，媒介出于把关的目的往往也会忽略大量的不利于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例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在美西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塑造为无法反抗政治强权的弱者和受欺辱的对象，其间多少包含一些对美西方国家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总之，服务于俄罗斯对外传播的形象建构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被固化和标签化，即便相较从前有所突破，也是从一种原有的认知框架陷入另一种认知框架陷阱中。

3.3 作为争夺世界话语的突破口

萨义德^[4]认为，帝国主义与媒介文化之间存在

紧密的联系。在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凭借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张，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在现代传媒等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在“西方中心论”的全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媒体强国掌握了全球传播的话语权，而与此相对的东方则成为被文化霸权和建构的他者。而早在《东方学》中萨伊德就提出了“东方”的概念，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只有那些符合“东方想象”的内容才会进入到国际话语视野当中，获得国际话语认同。而想要打破这种国际话语传播的困境，不仅要通过自我表达还需要借助他者表达^[5]。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以美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占据总报道样本的较大部分，其中部分报道涉及“反对美国打压中国留学生”的议题并且引用中国与俄罗斯官员的言论反抗美西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污名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他者表达能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有效互补，抵御污名指控所带来的孤立。

然而，部分报道虽存在反污名化的话语表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美西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依然没有脱离西方媒体的框架，中国留学生依然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受害者的地位。此外，报道更多的是针对新闻事件的客观陈述，并没有寻求反向的议题设置。因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虽然有助于重塑中国形象进行反污名化抗争，但是其效果较为有限。加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针对中国观众的新闻媒体，这就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的色彩更为不足。

4 总结与讨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呈现出多元化

的叙事特点，其结合不同的报道框架和报道情感塑造出多样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通过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塑造了三种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这也形成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的三重叙事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传播局势，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时，突破“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传播局限是目前我国对外传播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能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两国关系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中俄建交75周年的大背景下，中俄媒体也应打造多元互动交流的环境，促进中俄两国友好合作，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M]. 包凡一,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78.
- [2]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M]. 常江,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64-278.
- [3] 卿志军. 标签化: 负面新闻对事件形象污名化的策略 [J]. 当代传播, 2014 (5): 101-103.
- [4] 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 (第2版) [M]. 李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3.
- [5]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5.